

当年花褪残红青杏小

——李国文先生与我

汤世杰

直到现在,今天,此时,我才终于缓过劲来,平复下来,能仔细想想这几十年前的事了。

2022.11.25 上午10点半,李国文先生夫人刘士蓉老师,就用李国文先生的手机,突然发给我一条微信,看得我一惊:“世杰,我是国文老伴刘士蓉。国文已于二十三日夜突发心脏病走了。孩子在陪伴我,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不必回信回电。”

天哪,我怎么可能不“回信回电”呢?我立马回信:“哎呀,太意外太突然了,二十一号那天,我还跟他通过电话啊!永失吾师,痛心不已!”“我无法说出我此时的心情!本以为,过几天先生就能看到他为我作序的那本小书了!心痛!”

想了想,国文先生走时,已届93岁高龄,就在那前几天,我不托朋友专门在他92岁生日前一天去看望了他,还在他生日当天,送上了九十九朵红玫瑰——近些年,每年我都是照例这么做的。先生的这一生,既历经坎坷,又成就卓绝,多少人都把他记在心里,引以为傲。我多年置身偏远之处,与先生见面甚少,交谈也不多,甚至如他所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世杰是淡如空气”,但人与人之间,有时就是那么仅有的几次交往,转眼就是一生。他往那里一站,就成了路标,成了灯塔!

“人生常常都是这样,最重要的时刻来临时,我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注意,我们不是忙着过去,只有当我们回顾从前时,才能了解哪些才是生命的重要时刻。”(费德里科·费里尼《小丑的流浪》)

时间不计算,一算,已是四十多年!

1979年,南国莺飞草长的三月,离红嘴鸥定期准时造访春城昆明的肇始年1985年,还要等六年。一群来自全国铁路各地的写作者,却相会在三月的昆明站台上。站台从来都是相见告别情意深浓的地方,不知发生过多少凄婉或豪壮的故事。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都没法绕过一个小小的火车站站台。没想到,我此生命运的转折,也与站台有关。原来分头在广西和云南采访南部战事的二十多个人,那时正为即将回京的几位送行。我茫然不知,一位素昧平生的长者正在那里等我。那就是李国文先生。

参与那场赴边境前线的采访活动,于我是个意外。此前,我因偶然原因,并非自愿地从一个底层养路工区,调到昆明附近一个铁路单位,搞宣传。部门负责人是位南下女干部,待人甚好,而当时整个社会的高压都因依然难于解脱。幼时爱读小说诗文,虽学了工,无聊中我开始试着写作自娱,无非在铁路或地方报纸上发发,挣几张“购书券”,到新华书店换几本书看。1976年后,我坚决要求“归队”去搞本行,恰新来领导急需岗位安插人手,我得得以脱身。铁道部的那次活动,我因从单位上临时抽调出来允准太晚,和同样迟到赶到云南的一位广州局作者一样,没赶上大队伍,只好后人相约,到离前线还有四五站地的滇越铁路蚂蟥堡小站待了几天,天天泡在南溪河里,最后才到河口转了一圈,回到昆明不几天,就到了那次活动即将结束各奔东西的日子。

站台上的那群人我几乎都不认识,他们正聊得起劲。我很忐忑地站在人群的最外圈,也插不上嘴。就在

那时,一位身板魁梧宽厚的长者朝我走来,说你是汤世杰吧?我忙说是。我是李国文,长者说,这次你交的作品,一篇散文一组诗,我都看了,写得还不错!对我,那表扬来得突兀,却让我如释重负,听说稿子终于过关,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回答。半天才憋出一句:谢谢李老师!其实那时,我还不知道李国文是何许人也,但他往那里一站,就成了路标,成了我的李老师了。且从此没有改过口。

——该不该称呼一个人是老师,不完全取决于年龄长幼。老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师,甚至有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一些比我年轻的人,从来都称国文先生为“老李”,他们有自己的理由,我有我的道理。即便以年龄论,先生也足够为我师长。

那时的李国文先生,还没那么“著名”,刚刚摘去二十多年的“帽子”,以一个普通人身份出现在我面前。加之“当时出门青杏小”,我对外界知之不多。之前我不仅不认识,甚至都没听说过他。

但国文先生显见是有备而来,跟着又问我,除了诗和散文,写小说吗?我如实相告,没写过,也不会写。先生便说,你的那篇散文,有情节有故事,如果再把人物写好些,写出个性,就是小说了!你不妨试试。我心想,有这么容易吗?嘴上倒忙答道,好的,我抽空试试。先生又说,我相信你能,先写它二十、三十个短篇,再说!

先生的语气,强大到他厚实的身板一样,让人毋庸置疑,无可推辞。

那似乎就是一个约定。就中还有期待、鼓励与信任——对此,即便在当时,我也是能打心里感受到的,而且我知道,那比什么都要珍贵。

那时我已36岁,花褪残红青杏小,早过了做文学梦的年龄。但就那样,从此我居然鼓起勇气,心里攥着一个嘱托,一把热乎劲,莽莽撞撞地上路了。

认识一个人,那当然还只是开始。

1980年夏天,铁道部要抽调几个人,去山海关编一本书,其中有我。在跟铁道部文联联系怎么去时,我顺口问了一句,怎么联系李国文先生,他在哪里?那时,先生复出后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月食》刚刚发表不久,轰动一时。电话那边说,他现在就在这里,于是我在电话里再次听到了先生的声音。他问了问我抵京的车次时间,一口答应说,我去车站接你!我忙说不行不行,我已经知道该怎么走了,您就别管了。先生说,一言为定,我去接你!结果,我那趟车晚点4小时到达,国文先生硬是在车站等了我四个多小时。一起去到先生在羊坊店铁路住宅区的家,是个不大的套房。那天好像说了很多话,有一阵,是坐到先生的卧室兼书房,他从书桌下小柜子里,拿出一大堆用铁路工地上的材料单装订起来的读书笔记,气定神闲地告诉我,在工地上没事时,就读书,《红楼梦》读了三遍,《三国演义》读了三遍……都做了读书笔记!所有这些,我都听在耳里,记在心里了。我虽也喜欢读书,何曾像先生那样读过?当若干年后读到先生那些引经据典谈及古今文人的随笔时,我总会想起那个温暖的下午。

1984年,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在《十月》杂志第四期刊出。后来我听先生说,有天他去《十月》开会,见有人说起那部小说,他便主动应承,写了篇随笔式短文,发在《十月》的第五期上。

有一段时间,我赴京开会办事,总要抽空去看看他。那时先生已搬了新居,方正宽敞的客厅兼书房,铺的竟然是白地毯。一次我冒着风雪去了,一看那架势,想赶快脱下满是泥水的靴子,先生坚决不让,拉着我往里坐下,把地毯踩脏了一片,让我一直后悔到如今。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先生主动写的那篇短文,我还请先生给我写过三篇序,一是我的一个长篇,一是我的这个五卷本文集,一是最近刚刚出的那部散文选。每次只要我开口,他都满口答应。最后这次,我犹豫多时,担心他年事已高,便不写,最终我还是硬着头皮开口了。先生说,你怎么不去找那些散文大款写啊?我说,谁是大款啊?您就是啊,我还能找谁?您就写几行字,几百字,都行!先生一听就乐呵呵地笑了。

也就是说,我这辈子出书,除了自己写序,曾请人作序的,都是请的李国文先生。有时静夜偶思,万物苍生,能认准一个人,一个方向,便满满地似觉有一种从一而终矢志不渝之叹,不知对那错耶?!只是不知,《不求多产,但要精粹》一文,是不是先生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

江湖行走多年,我一直以为,虽然亦暗自努力,但以至今无甚堪称成就的成就,很不好意思在自己脸上贴金,说先生乃吾师。但在我心里,先生是一直在着的。与先生,这么多年,我们没谈过什么小说作法文章秘诀,得空,谈的都是日子,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这个世界上过的烟火缭绕悲欢交集的生活。坐在那个一尘不染的客厅里,我们会谈起远山,大川,行云,谈起云南的茶,从烟熏火燎的绿茶,到蕴涵淳

厚的普洱,冰岛,昔归,云南红;谈早年有时逢年过节,北方万物枯槁,从云南托进京列车给他捎点南国的新鲜蔬菜,韭菜,豌豆尖,芥蓝,茼蒿,以及鸡枞菌……让先生过个“维生素”充盈的,生气盎然的年。谈儿女,谈家庭琐事,谈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有这还不够吗?还奢望什么呢?我很满足——所有的文字,不都是从那些毛茸茸的日子里,点点滴滴生长出来的吗?!

遥望西天,云霞崔巍处,先生就像一尊佛,自己早已劫渡渡尽,然后又既苦渡了众生,也苦渡了我——

我知道,深深长长的思念,是不必呼天抢地,大声嚷嚷的。

2023.1.12 于夷陵桥头

编者按:

《当年花褪残红青杏小》是笔者今年1月13日收到的文章。可惜未及刊用,我们就惊悉汤世杰先生于1月28日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岁——他1月27日8点18分还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终于把一块头顶的方格天花板看成了一面迎面而立的立墙
线条有时倏忽飘散
有时又横七竖八的插出一座金字塔
连绵的帘幕挂环而成了千钧铁骑
某处还映印出了一幅水墨画
也看到了无,看到了空,看到了对岸的青山,近处的江流

一切都还这么诱人,
你是否做好了准备?

拙文标题的这五个字出自新近出版的三卷本《汤世杰散文选》之“后记”,说的本是那些沉隐于江湖深处高手的某种状态,但引伸开去也蛮有意思,遂“拿来”一用。

初闻世杰兄其名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了,面对《情感债务》《土船》《情死》这些颇具民族文化与风情韵味的长篇小说,想当然地以为作者就是来自云南边陲;待到相识,才知他竟然生长于有“川鄂咽喉”之称的宜昌市,竟然还是1967年毕业于长沙铁道学院(现为中南大学)建筑系的理工男被分配至“彩云之南”而落户。满以为他会顺着自己小说创作的势头节节开花时,结果作为小说家的汤世杰却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则是在不同报刊上读到他的散文。直至新近看到作家出版社新鲜出炉的三卷本《汤世杰散文选》时,始知这些年来他“转向”专攻散文创作,而这部收录了182则散文,总字数达113万字的《汤世杰散文选》由于每则文后并未注明写作时间,因而我不敢妄言这些作品究竟是他全部散文写作的精选还是某一时段作品的结集,尽管我个人倾向于前者。好在本文并非全面评说世杰兄的散文创作,而只是由此生发出的若干随想而已。

“隐韧”似乎是个生造词。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常用工具书中查不到,“度娘”上也搜不着。既无标准答案,那就由着自己的理解来吧。“隐”即隐藏隐匿,亦可引伸为淡泊功名;而“韧”则柔软、坚实而不易折,有一种恒久顽强的劲头。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状态,俗话所说的“耐得住寂寞”大抵如此。说实话,我虽很欣赏这种状态,但也明白欣赏归欣赏,真要做到莫问收获,只问耕耘又谈何容易?在中国文坛,小说家似乎总是要比散文家名气大一点,虽没什么拿得上台面的大道理,但现实确实是如此。世杰上世纪在他小说创作势头正旺时却毅然“转向”专攻散文,虽“出版了14部散文随笔作品”,“却依然游离在‘散文界’之外”。这确是需要一些“隐韧”劲儿的。对此,世杰自己也不讳言,“那种来去无痕的独行、深隐无声的孤独,我虽未敢自许,倒是心怀敬重的。”所谓功名与成就、掌声与鲜花,说到底都是些身外之物,但真要放得下来,还真要点隐韧的修炼,作文如此,做人更不例外。

世杰的散文,虽也有少量习见散文写作的套路之作,但总体感觉则是个性迥异,尤其是有关滇地自然与人文习俗的书

隐韧的独行

兼悼汤世杰

潘凯雄

写更特别:一山一水、一花一木、一砖一瓦、一习一俗,观察之细,用心用情之专实不多见。文字虽未必俏皮,但一笔一划又多藏推敲;整体行文未必华丽,但静下心来又能读出投入之多用心之致。我不知道这样一些特点的形成是否与世杰人生的“迁徙”与职业的“跨界”相关;从地处中华腹地的中部进入西部边陲,从理工男跨入人文界,由陌生引发的新奇与吸引,由精准带来的探究与细腻。当然他此前从事小说创作时的取材与表现多少就已见出这种端倪,而到了散文创作时则更加得以放大与强化。因此,凝重大于灵动,拙朴多于华丽成为世杰散文创作的一种显著特点。打个不太恰当比喻,这样的散文书写有点类同晚唐时期那“苦吟诗派”;斟酌再三、推敲有加。而在这背后其实是一种用心认真的创作态度,这其实也是一种“韧”。

由于各种因素的交集,近几年我主要是写点书评,特别是在《文汇报》用专栏的形式逼着自己历时五年多总计写了一百篇。虽有意识地避免使用一些文论的专业术语,尽量写得口语一点、直白一些,但集中起来一看还是无单一呆板之嫌。看到世杰的散文选中有“临窗私读抄”与“简帛友人书”两辑总计四十余篇散文,估计与阅读相关,遂率先浏览起来,内容所涉果然大都是与云南相关的一些作家学者或书籍,或以人说书,或借书讲人,或人书兼谈,不拘一格。以散文的形式鉴赏或评说作家作品,重要的其实并不在于形式,但更见出作家的学识与功力,既聚焦于某人某书,更读得开去,骨子里是一种融会贯通。记得20年前我在终审范稳的《水乳大地》时,如果当时是匿名审稿,一定想不到作者会是他,这部新长篇几乎完全颠覆了范稳在我脑子里的印象。而这次读到世杰的《灵魂神秘飞翔》一文,虽只有区区千余字,却立时明白了范稳创作何以会发生那种脱胎换骨的变化。又如“横竖都要面对时间与河流”这几个字既是世杰三卷本散文选中一本的书名,也是其中篇名之一。说的虽是徐则臣在滇南普者黑的一次邂逅,看似漫不经心在那里述说着自己故乡的那条大江和则臣家乡门前的那条大运河,实则从一个特别角度道出了则臣何以有了《北上》的一个缘由。

回到世杰这三卷本散文集的“后记”。其中有“听闻那些沉隐于江湖深处的高手,是一心专注于自身修炼,无意老在某界某会露脸的,向来都孤身上路,独自而行”这样的文字。这是对那种“隐韧的独行”状的形象状写。作为这则小文的结束,忽然想到还应补充一点,世杰其实也是血性十足的一条汉子。差不多30年前,他和黄尧兄陪我们几位朋友同走老滇铁路,完全想不起具体情况了,只是记得某日途中他俩为保障我们行程顺畅发过一次大火,那“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大侠”状着实让我当时给愣住了。如此“大侠”同时欣赏“隐韧”其实只是就创作不为功名而言,这种状态下流出的文字自然是纯粹而通透,值得尊重。

还是在元月4日,世杰兄在信告“我感染了,呼吸困难,幸无白肺,但对呼吸系统造成重创,现住医院治疗”的同时也告知了他的这部散文新作将由出版社责编直接递我;除夕下午还收到他以篆刻“薰风和暖”的新春祝福。27日我连续两信欲向他讨教其新作中的一两技术问题,但均未见回复。这不是世杰风格,遂有不祥之感,便赶紧着手此文写作。不曾想到昨夜回甫一完成,即看到他不幸辞世的噩耗,甚是悲伤!世杰兄一路走好,天堂没有病痛!

2023年元月30日晨补记



似曾花开(国画) 公波

小料理

潘敦

系,森先生果然不负父望。大学一毕业就到中国旅行,从此与中国结缘,工作了十年从来没和中国断过联系。喜欢中国的的风土,更喜欢中国的美食,尤其是传统的中餐,森先生常驻北京的那两年和北京同好中餐的日本人组织了一个美食团体,定期尝试京中各家老字号菜馆。森先生给我看过一份清单,大约四五张A4纸打印出来的表格,罗列了一百多家北京的老字号,有些我也吃过,丰泽园、东兴楼、柳泉居,更多的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晋阳饭庄的香酥鸭,砂锅居的砂锅白肉……表格上除了菜馆的名字,还列出了每间餐厅的特色菜,甚至还有森先生和朋友们用餐后对餐厅的评价,简直就是北京老字号餐厅的就餐指南了。

在上海的时候森先生吃中国菜少,吃日本菜多。我和森先生经常偶遇的那间日式小餐厅叫“和心”,我们都喜欢

叫它“小料理”,三四张桌子,十几个座位,吧台上放着主厨奥田先生当日准备的菜色,有些四季不断,炸牛肉土豆饼、炸竹荚鱼、日式土豆胡萝卜煮牛肉;有些则呼应冷暖,冬天的关东煮、炖白菜猪肉卷,夏天的苦瓜炒蛋、丁香鱼青椒,一盘盘摆在那里,而客人点好想要的菜色,奥田先生就会从相应的大盘里取出一人的分量放进小碟,再拿进后厨加热、上桌。

奥田先生当然也是日本人,今年应该七十多了,一头白发日渐稀疏。2011年刚到上海时,奥田先生就在这间小料理工作,他的菜从简单,从来朴实,可口可意,暖胃暖心,不是聚光灯下的舞台,倒像是风雨后的港湾。森先生喜欢奥田先生的菜,我也喜欢,我们都喜欢趁奥田先生不太忙时陪他喝一杯。森先生坐在吧台永远开一支1800毫升的餐酒,一次喝不完,就分两次、三次;我也喝清酒,750毫升的瓶子,每次

请老板唐小姐搬出冰箱里的存货给我挑,有时一瓶,偶尔兴起,再开一瓶,喝不完,存回冰箱,下次接着喝。于是每次我和森先生在小料理偶遇的日子里,奥田先生面前总是有两个杯子,一杯装森先生的餐酒,一杯装我当日的选择,这厢饮一杯,那厢饮一杯,一杯复一杯,岁月年华,一期一会。

在中国住了十年,奥田先生还是说不了中文,也难怪,平日餐厅里来和他聊天的多是像森先生这样独居上海的日本客人,那些和我一样住在附近的中国人则都由唐小姐招呼。难得休息日,他去的餐厅、酒馆也都是日本人开的,中文实在派不上用场。

两三年前唐小姐就和我暗示奥田先生打算回日本了,毕竟上了年纪,餐厅的工作越来越耗心神和体力。唐小姐说了好几次,我将信将疑。不过每次到餐厅,只要还能看到奥田先生站在吧台后面操作料理,不紊不乱,我就想也许是唐小姐多虑了,也许奥田先生也并不服老。直到前年八月,唐小姐忽然和我说奥田先生归期已定:在日本的儿子替他生了孙子,儿子、儿媳都有工作,分不了身,只能求奥田先生回日本帮忙,毕竟是天伦之乐,回老家含饴弄孙听起来都比在异国伺候我们这些挑剔的食客来得诱人。前年十月奥田先生回日本之前那两周,店里天天满座,熟悉的食客最怕失去熟悉的

风味,那种伤感,堪比离别。

奥田先生走后,唐小姐又试着找了位日本主厨,有些她满意的,客人不满意,有些客人满意的,她却又抱怨。去年六月新来的那位师傅菜做得倒是真好,有古风也有新意,我以为小料理从此又能稳妥,唐小姐却说这位日本师傅与她无关,是新来的日本老板请的,她做了十多年餐厅,越做越难,越做越累,趁着有人愿意接手,这个月把店顶了出去。

六月底唐小姐离开小料理,那家店也改了名字,我知道店里的菜色也许还是我喜欢的菜色,走进店里还是会像走进东京深巷里的某间小酒馆一样,听到也陌生,也熟悉的日语交谈。不过能陪我喝一杯的奥田先生不在了,会和我谈中文的森先生也不在了,连唐小姐都走了,那间餐厅对我来说就是一间新餐厅了。我的邻居张幼麟先生从前也是小料理的常客,我介绍他去的,张先生说他这辈人有些莫名的礼数和矜持,生人新店,没有朋友介绍,从来不敢进去。我过了四十多岁渐渐明白张先生的礼数,体谅他的矜持,生人新店,没人介绍,我也越来越不敢进去了。最后那次在小料理吃饭时,唐小姐告诉我她七月会去日本,办些公事私事,“顺带找找看厨师,要是找到合适的,我会回来的。”

森先生终于要回日本了,在中国常驻了十二年半,遇上疫情,久久不能回国和家人团聚,也算也快三年了。去年森先生和公司商量了很久,总算敲定九月调回日本总部工作,也算是叶落归根了。我恭喜森先生如愿归国,还想替他在龙门阵践行,森先生谢谢我的好意,无奈为他送别的餐会、酒会已经排满两周,他怕自己不胜酒力,“还是等您到日本的时候,我们在东京再聚吧。”也好,离别这件事让人伤感,也让人尴尬,还是重逢叫人憧憬。

快六十岁的人了,森先生是中国通,中文说得又标准,又流利,连上海方言都能接上几句。虹梅路我家对面的那间日式家庭料理森先生和我从前都去得很勤,总能在店里不期而遇,每次见到森先生,他总是笑眯眯的样子,很谦和,也很健谈。他和我说他父亲很年轻的时候被征召参加过侵华战争,到中国战场没几个月,日本就战败投降了。当时老森先生身在汉口,受降仪式上听闻训话,挑起战争是政府的错误,而不是人民的错误,日本政府应该为战争负责,但中国人民并不会因此迁罪于日本人民。老森先生闻此如闻醒钟,满心震撼,深受感动。回到日本,娶妻生子,从小教育森先生长大后一定要学习中文,去了解这个充满着善意和宽容的国家。

高中毕业考上早稻田大学中文

